

【“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研究专题】

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冲突

——以《棉花帝国》的历史叙事逻辑为例

靳凤林

摘要: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书是近年来引发国际学界广泛关注的经济史著作,透过该书的历史叙事逻辑能够清晰地看到,在人类棉花纺织业发展历史上,正是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之间既彼此交织又激烈冲突的复杂性伦理关系,导致了近现代以来不同民族国家间的贫困和不平等,使得全球范围内南北、东西之间的财富鸿沟日渐加深。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就必须站在哲学伦理学的视角,深刻检审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之间的国际伦理冲突,并使其在实践层面实现全方位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全球正义;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4-0080-11

“全球正义”作为一个歧义纷呈的政治伦理学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通过对基本正义原则的遵守,实现人类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合理分配,人类建构全球正义的终极目的是要通过摆脱国家间的贫困和不平等来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全球正义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回应性研究。重点是对西方全球正义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如对以罗尔斯《正义论》和《万民法》为代表的全球正义研究进行翻译、介绍、评述,还涉及对罗尔斯的弟子涛慕斯·博格的国际正义思想研究,阿马蒂亚·森、彼得·辛格等人的全球贫困研究,布莱恩·巴里、查尔斯·贝茨等人的全球不平等问题研究等。二是还原性研究。重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正义理论予以深入研究,如西方学者大卫·哈维通过对《资本论》研究提出全球空间正义理论,艾伦·伍德对马克思、恩格斯全球正义理论的研究等。三是现实性研究。主要是针对当代国际社会各种非正义性重大现实问题展

开研究,如中外学界的基辛格、亨廷顿、马凯硕、郑永年、朱云汉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尽管主要关涉国际政治、国际法律、国际贸易、东西文明、外交实践等具体领域,其主要内容并不属于哲学伦理学视域中的正义范畴,但其所讨论问题的背后却隐含着深层的全球正义价值指向。在笔者看来,全球正义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中国古代有对“大同社会”的恒久向往,西方很早就有对“理想国”和“上帝之城”的不断探索。但自从哥伦布大航海开启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近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正义是在全球东方与西方之间、南方与北方之间对照之下,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果。其间,不仅西方世界内部形成了贫困与富裕持续对抗的非正义性社会结构,全球范围内也形成了贫困与富裕彼此冲突的东西、南北之间的非正义性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全球化的视角,从全球东西、南北之间不断互动的历史中探赜索隐,才能最终觅得全球非正义结构赖以生成的隐性社会根源,进

收稿日期:2022-02-24

作者简介:靳凤林,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伦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哲学博士,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091)。

而证得科学理想的建构全球正义和实现人类共同富裕之路。

在这方面美国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教授的《棉花帝国:一本资本主义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以下简称《棉花帝国》)^①,通过叙述棉花产业的发展历史,为我们揭橥了欧美发达国家如何经过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在数百年间重塑这一重要产业,在主权国家、跨国资本、非洲奴隶、全球劳工等各种社会要素共同作用下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进而造成了今天全球不平等的国际格局,并明确预示了求解全球不平等与摆脱国家贫困的正义之路。本文试图以该书的历史叙事逻辑为依据,通过对棉花产业全球发展史的深度解析,借助以点带面、比较互鉴和视域融合的哲学诠释学方法,来深入揭示全球正义与权力、资本、劳动的国际伦理冲突的内在关联,从中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回应性研究和还原性研究的现实主义全球正义理论求索之路。

一、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利益博弈

贝克特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5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由枪炮和账簿开启的战争资本主义阶段;二是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由欧洲科技革命开启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三是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后的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和跨国资本利益博弈的性质与状态各不相同。

(一) 先发国家内部权力与资本的利益结盟

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关系是《棉花帝国》历史叙事逻辑的一条主线。贝克特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谈及“资本主义”一词时,都会想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当我们深入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史中考察时会惊奇地发现,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存在“世殊事异”的质性差别,这种差别又与特定历史阶段国家权力施政重心的迁移和资本发展面临的瓶颈密不可分。

在战争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繁荣的主要表现形式不是在机械化的工厂中完成的,而是借助国家的军事财政力量,通过暴力掠夺美洲原住民土地

和大量贩卖非洲奴隶,然后再在美洲大陆残酷剥削奴隶实现的。贝克特在《棉花帝国》第一章中指出,早在5000年前,棉花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就在地球南纬32度至北纬37度之间被亚、非、拉各洲人民所种植,他们主要以家庭作坊的方式自产自用,少量剩余产品在乡间集市出售,远程棉纺贸易的数量很少。其间,印度和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棉纺织品制造中心,欧洲受地理位置所限,主要是亚麻、羊毛生产较为流行,棉纺业极端落后,乃至欧洲人经常把棉花想象成“植物绵羊”的样子。^②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大陆之后,欧洲先发国家的商人阶层在本国军事和财政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在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而非洲统治者特别喜欢用印度花样繁多的棉布换取奴隶,致使奴隶贸易对棉布需求剧增,欧洲商人开始加大对印度棉布的采购,以便购买更多的非洲奴隶运往美洲大陆从事蔗糖、烟草种植和金银矿的开采,将赚取的利润再回流到欧洲本土消费,由之带来欧洲大陆的早期繁荣。再到后来,欧洲商人开始大量窃取印度纺织技术成果,直接在欧洲生产棉布,到非洲购买奴隶,再让非洲奴隶到美洲种植棉花,为欧洲纺织厂提供原料,致使本来不适合种植棉花的欧洲变成了世界纺织基地,特别是处在地球高纬度上的英国曼彻斯特,最不适合棉花种植却成了全球最具活力的棉花纺织中心。上述以印度纺织品为中介、以非洲为奴隶贸易转运站、以美洲为种植基地、以欧洲为生产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如果没有英国海军力量的大力支持和远洋运输业的高度发达,单纯依靠商人阶层的一般性贸易往来,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其间,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的深刻关联昭然若揭。

如果说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大量土地的攫取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破土而出的肥沃土壤,那么英国发明家的才智、市场规模的扩张、水运和海运的优势条件、企业家的新教伦理精神等诸种要素,则构成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内生动力。学界普遍认同英国纺织业的起步最早源自对印度纺织技术的窃取,但到了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哈格里夫(James Hargreaves)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使纺纱的速度得到极大提高。10年后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又发明了骡机,能够抽出五英尺长的更结实更细密的纱线。到了1769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代替水力驱动的蒸汽

机。上述发明使得纺织业逐步由家庭纺织转向工厂纺织。伴随英国纺纱厂数量的迅猛增加,如何将英国的纺织品销售到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地,成为英国商人和政府关注的重心。特别是英国商人发现,从事纺织机械制造更是利润空前,于是,他们开始通过在世界各地出售纺织机械,进而就地办厂赚取巨额利润。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利用自己的强大海军作保障,大力提升本国远洋海运的力量,并在保护全球市场、监控国家间商业边界、规范全球纺织机械制造、确保遥远国家的合同得以有效执行、为本国企业家提供金融支持、通过提高薪酬动员劳工等方面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了英国由战争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过渡,也带动了整个欧洲其他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此时的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在亚洲、非洲、美洲继续采用战争资本主义的方式,为本土工业输送包括棉花原料、奴隶种植、远洋贸易在内的各种工业血液,并不断开辟更为广阔的全球棉花市场。

欧洲列强纺织机械和棉纺产品在全球的畅通无阻,极大地刺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纺织业的发展,使得棉花产业逐步由工业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变,形成了全球棉花市场的精细分工:有人专注于将棉花从种植园运送到港口;有人集中向制造商销售原棉;有人专门负责进口他国纺织品;有人专门将进口的纺织品予以销售。与之配套的国际棉花和棉布质量标准体系、国际棉花市场经纪人体系、国际棉纺品金融结算体系等日益完善。在整个全球棉花市场中,美国黑奴生产的棉花数量曾长期占据世界头号位置,对全球棉花制造业影响深远,这也使得 1861 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棉花制造业形成巨大冲击。伴随内战结束,美国北方工业和南部棉花种植日益融合,美国自己的棉纺制造业迅猛崛起,与欧洲棉纺业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迫使欧洲棉纺业开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本国殖民地内寻求棉花资源和从事棉纺生产。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散,棉花资本更多地与后发国家主权捆绑在一起,使得后发国家成为支撑棉花产业持续扩展的重要机构,这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印度、埃及、巴西等国家棉纺业的转型发展,使得棉花产业的全球版图发生重大重组。到了 20 世纪初,欧洲列强内部的经济危机接连爆发,对本国之外各国殖民地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最终引发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全球南

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各民族均将发展棉纺业作为首选目标之一,今天全球棉纺业的重心已经重新回到南方各国。昔日的全球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已经不见棉纺生产的踪影,只剩下残留的棉纺博物馆供世人参观,成为见证那段历史荣光的工业遗迹。

(二) 先发国家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与全球不平等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对全球棉纺业发展历史的描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先发国家如何依靠武装暴力占据全球棉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构筑起全球经济发展的非正义性财富鸿沟。但要深刻洞悉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先发国家所采取的具体政治经济措施予以深度解析。

第一,欧洲先发国家最早通过重商主义政策完成了初步的财富积累。重商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而是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各国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而采取的一种经验主义政策。重商主义的核心是以各国拥有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其实力雄厚与否,鼓励人们出口货物赚取更多贵金属,限制进口货物以防本国贵金属流出。这就使得欧洲各国拼命提高本国制造业水平,通过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货物赚取国外贵金属,同时也激发了国家之间因市场扩张引发的领土争夺和殖民扩张。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通过经济间谍、法律禁令、武装贸易等手段,大量窃取印度棉纺生产技术,努力提高本国制造业水平,通过低价购买北美、巴西、印度、埃及等地的白棉,再在国内加工成棉布销往世界各地,以便通过提高本国贸易收入加大贵金属的国库储备;与此同时,又制定各种措施限制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的棉织品进入欧洲市场。最终结果是原有的松散性、多中心、水平式的棉花世界,转化成一个集中的、整合式、等级森严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棉花帝国。上述重商主义棉花产业政策,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棉纺业带来毁灭性打击,致使他们逐步沦落成只为英国种植和出口原棉又必须大量进口英国棉布的国家,后发国家很多依靠纺织维持生存的手工作坊变成了废墟,织工们流落街头乃至沦为乞丐。^③

第二,欧洲先发国家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造就了全球棉纺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前已备述,重商主义极大地依赖国家权力的武装保护,但英

国制造业初步站稳脚跟后,开始出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贸易自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自由贸易高于国家权力,只有让全球贸易自由开展,其最终结果将泽被人人,从而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过世界各国在后来的产业发展实践中逐步体悟到,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由贸易,其根本目的是要让英国商品顺畅地流入世界各地,淹没整个世界市场。一个国家如果无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不加保护地任凭其他国家商品流入本国市场,最终这个国家自己的工业生产将走向自我毁灭的歧途。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工业发展落后于英国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很早就派出大批企业家前往英国获取机器图纸、工具模型,高薪聘请英国技术人员发展本国棉纺制造业,将英国当作榜样和模板予以学习和复制,这极大地提高了欧美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将亚、非、拉各国的棉纺工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使之成为欧洲列强随意蚕食的市场肥肉。这种局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后发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才逐步得到改观。

(三) 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后发国家主权的深度重塑

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先发国家为了充分保障本国跨国资本的经济利益,除了采取上述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外,更要按照跨国资本的意愿来深度重塑后发国家的主权结构,而后发国家主权意识的强弱及其维护国家主权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它是甘于先发国家跨国资本的任意摆布,还是努力寻求自身的棉花产业发展之路。为此,笔者仅以美国、印度、埃及为例予以简要分析。

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夕,由英国棉花商人塑型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是支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棉纺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棉花产量占英国8亿磅棉花消费量的77%,它也占法国1.92亿磅棉花消费量中的90%,德意志关税同盟1.15亿磅中的92%。”^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曼彻斯特棉纺业和法、德等国棉纺业的空前繁荣是建基于美国南部奴隶的艰苦劳作基础之上的。但是伴随美国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美国北部自由州和南部蓄奴州对西部大开发中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林肯于1860年当选总统后,以解放奴隶为核心的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在四

年多的内战中,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棉纺业跨国资本家们,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南方蓄奴州奴隶主的利益,暗中为其提供人力、武器、金融等各种支持,鼓励他们脱离美国独立建国,其根本目的是让南部各州继续保持奴隶制棉花种植模式,确保对欧洲各国棉花资源的充足供应。但随着林肯1861年颁布《没收法案》即没收南方蓄奴州叛乱奴隶主的全部财产和奴隶,1863年颁布《解放宣言》即南部叛乱各州奴隶永远获得自由,使得北方军队在南方自由奴隶的帮助下最终获得了南北战争的全面胜利。废除奴隶制后,南部各州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为奴隶主无偿劳动的奴隶制转换成钱租租佃制和棉花谷物分成制,大多数奴隶转变成自我耕种和经营的佃农,少数奴隶变为雇佣工资劳动者,这就使得美国南部各州的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之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棉纺工业,不断出台各种棉花出口禁令和严查棉花走私行为,迅速崛起为与欧洲棉纺业抗衡的纺织大国。但必须指出的是,由欧洲跨国资本塑型的美国南部各州的奴隶制政治基因,一直是日后支配美国这一主权国家政治运演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今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族群撕裂等各种不安定因素,诸如新冠疫情期间“黑人的命也是命”、国会山暴乱等政治运动,皆是一百多年前奴隶制历史基因图谱的现代表达。

除了北美之外,欧洲先发国家棉纺业跨国资本对亚洲国家主权的侵蚀更加严重。以印度为例,自17世纪开始,欧洲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强行嵌入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之后,就开始在印度建立各种公司,诸如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16年的丹麦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公司的最大特点是将世界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在母国内部高度尊重并遵守本国的法律、体制、习俗等,在国外则完全不受母国法律规制,而是以屠戮原住民、奴役人民、强占土地维持其资本运营,而遥远的母国对其没有任何监督能力,乃至大肆鼓励这种非人道的做法。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他们本来是一伙英王特许公司的商人,后来逐步演化为武装商人,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32岁雇员罗伯特·克莱武率领3000名雇佣军,击溃了由两万骑兵、五万步兵组成的印度军队,从此开始了一家公司征服一个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⑤到了1765年他们竟然成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在此后的几十年,其所控制的领土

逐步扩张到南亚其他地区。这些公司通过暴力、体罚等各种措施,迫使印度民众按照公司要求种植所需棉花品种,低价收购各色棉布。这种国家特许公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私人政治权力的主张,显然是对经济权力观念的一种革命性定义,这种跨国资本与政治力量的结合使得印度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

除了美洲、亚洲外,欧洲先发国家棉纺业跨国资本对非洲国家主权的侵蚀同样值得深入分析。以埃及为例,这个国家是最先抛弃非洲模式跟随欧洲棉纺业发展的典型。埃及的棉花种植和棉纺产品生产历史悠久,早在 18 世纪埃及就已经开始向法国出口棉花产品,并向欧洲出口大量粮食。到了 19 世纪初期,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一心想仿照英国实现埃及的工业革命,通过购买英国棉纺机器、聘请英国技师、改造国内产业结构等措施,获得纺织业的巨大进步,有专家估计,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人均棉花纱锭位于世界第五位。^⑥这对英国在国际棉纺业市场上的地位构成巨大威胁,之后,英国开始通过限制供应埃及棉纺工厂蒸汽燃料、逼迫埃及棉纺市场全面开放等手段打压埃及棉花产业,使其逐步走向衰落。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伴随棉花价格下跌,埃及政府又无法偿还因挖掘棉花灌溉渠道、建设铁路运输、进口蒸汽泵等经济活动发生的各种国际贷款,最终因经济崩溃而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控制权,于 1882 年被英国政府全面接管。

二、跨国资本与劳工利益的深刻矛盾

如果说对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关系的分析为我们奠定了把握全球不平等和非正义问题的理论基础,那么进一步对跨国资本与各国劳工利益的关系予以深入研究,就为我们探寻全球不平等和非正义结构生成的根本动因找到了更加直接的历史依据。笔者试图以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原住民和非洲黑奴的深度劫掠为起点,进而引申出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最后再来讨论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亚、非、拉劳工的多重压榨问题。

(一) 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原住民和非洲奴隶的深度劫掠

在美国独立之前,英国棉花资本家在世界各地赚取经济财富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通过攫取原住民土地和榨取奴隶劳动这两种战争

性的暴力方式而获得。质言之,英美两国棉花制造业的财富扩张取决于大西洋两岸的暴力掠夺和残酷压榨。

就攫取土地而言,英国资本家要想扩大棉纺工业的再生产,必然需要充足的棉花原料,而美国南部各州的土壤与气候又是最适宜棉花生长的地区,如何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了英国棉纺业跨国资本家的首要任务。为了攫取美国南部各州的大片土地,英国跨国资本家人体自带和货物携带的各种病菌,使得缺乏免疫力的美洲原住民罹患各种传染疾病而大量病亡。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火枪洋炮驱赶和消灭原住民。这些拓殖者通过长期的战争活动,成功地将原住民的土地变成了法律上的“无主空地”,任由他们使用、交换、流通和买卖。此外,他们在美国西部拓殖过程中,还通过资本运作低价购买了大量土地,如 1803 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借贷英国巴林银行的资金成功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1819 年又从西班牙购得佛罗里达州,1845 年吞并得克萨斯州,使整个美国领土相对于原有的 13 个州而言获得了成倍的增长,南部和西部国土面积的持续扩张为棉花种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⑦

就压榨奴隶而言,如何在广袤的美国南部土地上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其基本途径是不间断地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贩运到北美,然后再转运到南部各州,视其为不用花销养育费和天然成熟的劳动力予以使用,从中大肆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借助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的说法,通过对奴隶心、足、头、右手、左手、呼吸、脊背、死亡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分析,全面描述了美国种植园的奴隶主如何通过各种酷刑来提高奴隶的劳动效率。例如,将一批又一批身披锁链的奴隶在港口市场分类后贩卖到棉花种植基地;把试图逃跑的奴隶杀掉后,将其头颅成排悬挂在奴隶住处,时刻警示奴隶逃跑的后果;通过严酷的鞭打方式训练奴隶左右手同时采摘棉花的能力;让其他奴隶对没有完成采棉指标的奴隶拳打脚踢,通过当众羞辱、饥饿禁闭等手段予以惩罚;随时随地拆散黑人家庭,强行割断其血缘关系,将成年或年幼奴隶带到集市上任意买卖;白人监工发明了数百种惩罚奴隶的恶毒刑具和方法;乃至随意奸污女奴等。^⑧可以说,英国跨国资本家和美国北方商人们正是踩在广大棉奴的脊背上,通过拼命吸吮他们的全

部血汗,先后建立起英国和美国的棉纺工业体系。这些财富大亨们庄严地端坐在资本的王座之上,镶嵌在其金色皇冠上的红、蓝、绿各色宝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但王座之下却堆满了无数奴隶的累累白骨。

(二) 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剥削

贝克特在深入分析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深度劫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跨国资本在其母国开办各种纺织工厂的状况,特别是就其剥削本国劳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贝克特在《棉花帝国》第七章中指出,在英国棉纺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之前,农民种植维持其温饱所需的粮食,工匠在小作坊中制造用于交换的物品,人们按时到教堂做礼拜,普通百姓和教士、贵族相安无事。但是自从棉纺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上述传统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型,大批人口被集中到一个又一个庞大工厂的车间中进行集体劳动,传统农民变成了工厂里的受薪工人,这些工人被当时的人们称作“新兴人种”。加之欧洲由于有着浓厚的家长制遗产和悠久的等级制传统,男性户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妻子和孩子的劳动,男性户主在继续从事农业劳动的过程中,允许孩子和女性到棉纺工厂中上班挣钱补贴家用,而欧洲女性结婚普遍较晚,可以有较长时间在工厂内工作。因此,在欧洲19世纪3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主要以被父母逼迫去上班的儿童和未婚女性为主,而儿童和女性的工资非常便宜,儿童只相当于成人工资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女性只能挣得男性工资的45%到50%,且儿童和女性工人相对听话,也比成年男人更容易接受惩罚。^⑨

这些童工和女工在纺织厂内被迫接受工厂主的各种残酷压榨。在住宿条件、工作环境和饮食方面,每天清晨日出之前,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宿舍床上爬起来,沿着山谷中的小路,穿过拥挤的街道,去散发着臭味的河边上的几十个工厂去上班。工厂车间由砖块砌成的庞大建筑物构成,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机器轰鸣声总是震耳欲聋,棉絮和棉尘四处飞扬,潮湿闷热。傍晚时分,又回到破败的宿舍,那里好多人共睡一张床,整个宿舍区脏乱不堪。他们穿的衣服破烂便宜,吃的食物很多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以消化的。^⑩其中,8—10岁儿童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10到13岁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以

上,13—14岁孩子每天工作13小时,14岁以上的孩子还要加夜班。由于不少童工无法忍受劳动的艰辛,经常逃跑或上班打瞌睡,一旦被监工发现,就会受到肉体惩罚,包括皮带抽打、棍子敲打、扇耳光、当众羞辱等。可以说,没有数以百万计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劳动,就不可能建立起全球庞大的棉花帝国。^⑪有关英国棉纺工业最为发达时期的劳工状况,恩格斯曾经根据他亲身观察到的可靠材料,专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该书远比贝克特《棉花帝国》对工人生存状况的描写深刻详尽。恩格斯指出:“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⑫

(三) 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对亚、非、拉劳工的多重压榨

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工业革命爆发前,亚、非、拉的广大农民在田野里种植棉花的同时,会间作其他粮食植物,如玉米、稻米、豆类等。之所以采取农作物间作的方式进行耕种,一是因为他们的棉花纺织品主要是家庭成员使用,剩余产品通过集市贸易交换家庭必需品,如锄头、镰刀等农具;二是他们还要通过种植玉米、稻米、豆类等其他农作物保证食物供给,不管棉花价格多么高,他们都不会放弃粮食作物的种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饥荒和挨饿。但自从欧洲机械制造的纺织品在全球广泛倾销后,手工纺织者大量失业,人们开始购买价廉物美的欧洲纺织品。据历史学家提尔坦卡·洛伊(Tirthankar Roy)统计,1830年至1860年印度手工制造业受到的打击至少导致200万到600万人失去工作,完全摧毁了古代棉花纺织业,给亚、非、拉各地的纺纱工、织布工和农村种植者带来灾难性后果。^⑬

到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内战结束后自身的棉纺业迅速壮大,出口欧洲的棉花急剧减少,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棉纺制造商开始在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广大农村,大力推广棉花出口种植,迫使农民由综合间作种植向单一棉花种植转变,并在棉花种植区周边直接建立轧花厂和压平厂,将棉花轧花、压平后通过铁路运往港口,再直接发往欧洲各地的棉纺厂。特别是电报业务的出现和1866年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电报电缆的铺设,欧洲商人可以在世界各地随时了解全球市场的棉花价格波动,世界各地

棉花种植中心和制造中心的信息交往更加顺畅,于是,遍布亚、非、拉各地的进口商、承购商、经纪商等中介商人逐步被淘汰,欧洲棉商在本国金融业的帮助下直接操纵全球棉花市场价格。到 1870 年前后,在伦敦、纽约等棉花交易场所出现了“棉花期货贸易”现象,即棉花贸易开始高度抽象化和标准化,不再涉及具体的棉花,各种棉花自然品通过约定的合同和标准直接与抽象资本相对应。毫无疑问,这极大地简化了棉花交易流程,但同时也带来了棉花交易的不确定性。1873 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后,棉花价格急剧下降,致使世界各地棉农大量破产,而此时粮食价格又大幅上涨,出现全球粮食危机。在一降一升中,巴西、印度、埃及等的大量棉农在棉业破产的过程中又无法买到粮食,最后被活活饿死。仅以埃及为例,它曾经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受英国商人鼓动,在美国内战期间开始大面积为欧洲棉纺厂种植棉花,逐步放弃粮食种植,越来越依靠进口粮食维持国民生存。然而,1873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伴随棉花和粮食价格的巨大波动,大批人口和牲畜因缺乏基本的粮食供应被活活饿死。这充分证明,任何国家要成功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化过程,必须强化自身的经济自主权,并大力提高承担风险和承受损失的能力。然而,在发达国家诱导和压迫下的亚、非、拉落后国家,既没有经济自主性,也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只能去承受全球化浪潮中跨国资本压榨带来的各种苦难与死亡。

三、主权国家与劳工利益的复杂互动

在深入研究了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国家与市场)、跨国资本与劳工利益(市场与社会)关系之后,必须对国家主权与劳工利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博弈予以深入分析,才能进一步把握全球非正义结构生成的深层社会根源。著名思想家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中指出,权力、资本、劳动之间是相互契合地粘连在一起的伦理共同体,但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试图摆脱权力与劳动的束缚,从三者彼此镶嵌的状态中逃逸出来,进入自由放任的疯狂舞动之中,并转身按照自己的资本逻辑来改造权力与劳动,但权力和劳动不会甘于资本逻辑的任意摆布,它们必然会做出自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就主权国家而言,它会在需要经济繁荣时,加大油门刺激资本的活力;需要照顾行动迟缓的劳动群体时,又会

通过刹车制动装置来延缓资本的运行速度。就劳工阶层而言,它同样会通过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来节制资本的疯狂运转,逼迫国家出台限制资本垄断的各种措施,让三方在动态博弈中不断达到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④基于上述逻辑进路,我们必须进一步对主权国家与劳工利益的关系探幽知微。

(一) 先发国家政府对本国劳工利益的打压与让步

早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伴随机械化棉花产业的发展,棉业资本家通过改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迫使其变成无产者而进入工厂工作。但因极低的工资收入、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原因,不断激发起纺织工人的反抗活动。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英、法、德等先发国家的纺织工人砸烧机器现象接连不断,罢工运动此起彼伏,较具代表性的有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面对上述现象,最初均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如英国政府 1795 年就出台了《危机治安集会处置法》,1800 年又出台了《禁止结社法》,单是在 1812—1813 年就公开吊死了 30 多名破坏纺织机器的工人,1815 年派驻军队进入纺织厂区,准备随时镇压工人暴乱。但是,哪里有剥削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到了 19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逐步意识到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导致警力不足和国家财政枯竭,也无助于劳资矛盾的最终解决,只会将国家陷入持续性动荡之中。

特别是欧洲各国工人运动深受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其他政治理论影响,各类工会力量日渐壮大,工会从最初的个别工厂发展到地区性组织,最终出现全国性工人联合会。工会活动内容也由工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发展到与资本家集体谈判,要求资本家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收入、改善福利待遇、优化工作环境等。伴随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的要求开始由改善经济状况转向获得政治地位,迫使国家废除各种限制工人罢工和集会的陈旧法律,并逐步给予工人政治投票权。而各类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不仅使工人运动卷入议会席位的争夺之中,也使大批工人政党领袖进入各级政府的执政队伍之中。以英国工党为例,它最早源自英国纺织业工人协会,后来逐步扩展至各个行业的工会之中,最终又从工会运动中脱离出来,成为英国议会中

的一个独立党团,并不断选举出自己的政党领袖,对20世纪的英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后发国家政府对本国劳工态度的极端复杂性

先发国家高潮迭起的工人运动抬高了棉纺织业资本家的生产成本,挤压了其纺织品的利润空间,这就迫使先发国家资本家逐步将其跨国资本向国外生产成本较低的后发国家转移,在欧洲棉花产业逐步失去全球优势的同时,新型全球棉花产业分工开始出现重大重组。由之,极大地带动了落后的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棉纺织业逐步由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迈向贝克特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阶段。这必然使后发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由于亚、非、拉各个后发国家的国际境遇存在重大差别,其政府机构对本国劳工阶层利益所秉持的行为原则与情感态度也就殊为不同。

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没有受到欧洲先发国家的直接殖民统治,其资本阶层所根植的国内政治条件和阶级政策偏好完全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19世纪中叶,当日本市场面临大量国外棉纺织品的巨大冲击时,1868年的明治维新让日本政府摆脱了德川幕府时期一盘散沙的状态,开始仿照西方先发国家推行更为积极的民族工业政策,包括大力支持引进欧洲先进纺织技术、帮助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压低工人劳动成本、制定纺织业发展的各种法律等。1879年,内务省大臣伊藤博文先后组织建设了10家棉纺厂,从英国进口2000个纱锭,制定了各种优惠条件,大力扩张本国纺纱能力。国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府官员成为纺织企业家,特别是伴随从中国进口棉花数量的急剧增加,日本实行了昼夜轮班的新型劳动制度。日本政府还将大量妇女赶出农村,然后逼迫其进入工厂工作,这些妇女大部分年龄在13岁—25岁之间,直到结婚后才退出工厂。她们共同住在工厂旁边宿舍内的大通铺上,每人只有27平方英尺的狭小床铺面积,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12小时,让机器24小时连续运转。资本家全面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其所支付的工资仅够维系妇女的基本生存,只相当于同期曼彻斯特纺织工人收入的八分之一,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劳动价值。且日本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厂法》直到1920年才出台,比欧洲先发国家推迟了四十多年。正是这种极其廉价又毫无政治权力的广大

劳工的存在,保证了日本棉花工业的持续扩张。到1902年,日本国内生产的棉布基本取代了进口的欧美棉布,到1933年,日本棉布出口首次超过英、法、德等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棉花强国。^⑮

与日本不同,由于印度、埃及民族工业直接受到英国控制,印度、埃及殖民政府主要是帮助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品进入印度和埃及市场,致使印度和埃及的民族工业家们要想发展本国的纺织工业,必须与欧洲政治家和资本家展开博弈。但他们开设的工厂对工人的压榨也同样严重,如印度棉纺资本家在孟买开设的工厂,纺织工人以男性为主,夏天的工作日一般要持续13—14小时,冬天要持续10—12小时,经常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工作,尽管殖民政府时常拿英国本土各种保护工人的法律约束当地棉纺资本家,但影响力十分有限。此外,印度、埃及民族资本家还要面临本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纺织工人的排外斗争,这些工人在反对西方先发国家资本家在印度、埃及工厂内的剥削行为时,也会波及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工厂,迫使其同时提高工人待遇,这必然使得印度、埃及的民族工业很难像日本那样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胜出。

(三) 中国近现代政府对棉纺工人态度的历史流变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大的棉花生产复合体之一,棉花纺织一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活动,这种传统优势到了棉花生产机械化时代,变成了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中国棉纺市场的对外开放完全是西方先发国家逼迫使然。

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棉纺厂——上海机械织布局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棉纺制造业已经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到1925年,中国棉花出口量超过进口量。^⑯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同样依靠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的工人昼夜轮班工作,每周只休息12小时。到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时期,为了防止棉纺工人频繁举行罢工和集会活动,经常派驻警察和部队来进行镇压。在1925年5月上海纺织工人的罢工活动中,就有13名抗议者被警察杀害,酿成了著名的“五卅惨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解决人们的穿衣问题,国家将纺织业列为重点发展行业,在上海、天津、西安、郑州、沈阳、石家庄等多个城市,建立起一大批纺织和化纤基地,初步建立起完整的纺织工

业体系。广大工人阶级开始在国有纺织工厂中当家做主,成为新中国占据支配地位的领导阶级,他(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为新中国逐步成为世界性纺织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

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国有纺织企业的深化改革,在压锭、减员、重组的基础上,使中国逐步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纺织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跨国资源配置能力迅速提升,既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技术、人才来中国投资纺织企业,也有大批中国纺织企业走向海外投资建厂,使得中国纺织品牌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对象。

近些年,伴随新型科技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我国棉纺业在全球跨国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升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据统计,2000 年中国纺织品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量的 14.8%,2007 年则达到 30%,成为全球最大纺织品出口国。2012 年在全球棉花产量中,中国占 29%,印度占 21%,巴基斯坦占 8%,巴西占 5%,而美国仅占 14%,英国只占 2%。^⑩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纺织业所做贡献最大的国家。

四、《棉花帝国》与全球正义问题的伦理学检审

通过深入探索《棉花帝国》的全球历史叙事逻辑,分析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棉花产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处理国家主权与跨国资本、跨国资本与劳工利益、国家主权与劳工利益的过程中,其伦理特质在全球不同时空既有时阶段性区别,又有总体性趋同。在 21 世纪新型全球化的今天,唯有从全球正义的伦理学视角,仔细检审资本主义棉纺工业发展史的是非得失,才能真正洞悉其根本缺陷,进而对主权国家、跨国资本、全球劳工之间的正义分配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性转型升级,不断消除导致国际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深层诱因,最终引领人类迈向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新台阶。

(一) 战争资本主义的善恶二重性与主权国家的多极共治

通过对贝克特《棉花帝国》旅程的全面解析,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早期——“战争资本主义”阶段,文明与野蛮构成了人类进步的一

体两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提出过“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及资产阶级的道德本性时也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⑪但在描述资本主义初期的时代特征时又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⑫并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⑬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制度的道德二重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理性认知。而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对战争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了最为真实的刻画。如果说火枪意味着暴力,账簿代表着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象就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执着火枪”,正是程度不同的暴力行为造就了资本主义早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网络。由之,迫使印度丧失主权后沦落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埃及经济崩溃后被英国政府全面接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全球东西南北财富鸿沟赖以生成的根本动因。但直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跨国资本对国家主权的深度侵蚀,才有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才有了全球南方和东方各个民族国家对自身主权的坚定维护。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类国际组织蓬勃发展,主权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维护和平、推动发展、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机制。今天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深刻体悟到,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摆脱近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意识,废除本国利益优先的虚假性多边主义逻辑,避免对多边主义采取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态度,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不断消解维持帝国霸权地位的各种制度支撑,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多边合作的重要议程,充分保障后发国家的正当发展权益,帮助后发国家增强发展能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让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

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不断实现人类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恒久期盼。

(二) 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境遇性与跨国资本的伦理责任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贝克特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后,先发国家的跨国资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创制了一系列崭新的现代性生产制度、贸易制度、金融制度、司法制度等。例如,纺织工厂的高效管理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现代企业的运营水平;对民族国家间商业边界的管控促进了国际市场体系的规范化;全球纺织机械产品的标准化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棉花和棉布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的确立促进了棉花期货贸易的出现;国际贸易法律规则的制定确保了遥远国家的合同得以有效执行;全球棉花产品货币结算体系促进了世界各国金融秩序的稳定运行,等等。但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各类制度创新皆是先发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在进行精细考量基础上逐步创制而成的,正如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由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其根本目的是要让价廉物美的英国商品顺畅地流入世界市场,但这也反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法国、德国、美国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项制度设计的形成和出台,皆有其自身的历史境遇性。在 21 世纪新型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对长期以来由先发国家跨国资本创立的各种生产制度、贸易制度、金融制度、技术制度等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真正适应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特别是照顾后发国家的根本利益,无疑是消除东西南北之间不平等、实现国际正义和全球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要完成上述转变,就需要跨国资本阶层必须承担起自身的伦理责任。一是在跨国企业微观经营层面,要通过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在信誉经营和守法经营基础上,努力求得企业股东利益和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责任之间的科学平衡。任何国家的跨国资本集团只有坚守“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基本商业道德原则,充分认识企业法人人格的极端重要性,树立信誉经营形象,坚守国内外法律规范,特别是要遵守国际社会服务于企业产品的 ISO9000 标准、服务于企业环境的 ISO14000 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等。此外,在新型全球化的今天,拥有成千上万名股东的大型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公司控制权与管理权逐步分离,

分散化的股东对公司具体的管理运营不感兴趣,只关心公司股票价值的高低,于是“股东至上主义”应运而生,公司高管们不再看重企业对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应负的社会责任,如何切实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显得愈发重要。二是在跨国企业宏观政策层面,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构建互利合作的全球网络,携手共筑共赢共享的实践平台。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它虽然源于亚洲,但却联通世界,至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有一大批项目落地开花,它为沿线各国通过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流通,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进而释放增长活力,实现市场对接,拉紧联动纽带,促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发挥了重要的亚欧大陆桥作用。^②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决不是对世界传统贸易体系的推倒重来,恰恰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为实现传统国际贸易体制的全方位拓展和全面性转型升级而进行的重大机制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消除全球不平等和国际贫困,让各国的跨国资本为人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 全球资本主义的价值流变性与劳工利益的保障途径

透过贝克特《棉花帝国》对欧美棉花纺织业跨国资本流变的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跨国资本的国际流动是人类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内驱力,其间,跨国资本创造的价值链通过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知识技术在各国不断地交换和流动,从而形成紧密交织和遍布全球的复杂网络。每个国家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该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得价值的多少。任何国家要想增加自己在全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就必须通过增加人工成本、设备加工、科技投入、流通营销等要素,才能在跨国协作和国际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增加值。增加值的流动虽然必须通过进出口交换为基本渠道,但它不以双边贸易为起点和终点,而是要通过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广泛流动得以实现。一个国家向全球价值链网络输出的价值越大,其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也就越大,一个国家向全球价值链输出价值的多少,虽然受到地理环境、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因素的影

响,但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的知识创新程度,而知识创新程度的高低最终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的整体样态。^②以英国为例,它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其地理环境完全不适合棉花种植,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也极其有限,国民消费棉花产品的能力远不及欧洲大陆,但由于其纺织机械制造能力和棉花纺织技术的高度发达,最终成为 19 世纪全球棉纺业的中心,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后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创新,实现了国民整体素质的大幅提升。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要使人类摆脱贫困和不平等、实现全球正义和共同富裕,全球南方和东方后发国家必须在提高国民经济收入和改善国民生活状况的同时,善于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大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美国著名人力资本专家舒尔茨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他们只重视物质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资。一个国家可以购买先进的发电装置、通信设备、计算机等,但这些物质资本只有通过那些有技术和经过培训的劳工才能使用并发挥作用,因此,提高劳工的知识水平、健康程度和纪律意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③正如中国古人所言“家有黄金用斗量,不如儿童上学堂”。我国棉纺工业之所以由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纺织大国迅速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纺织强国,直接源自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性、大范围的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全面普及全国城乡的中小学

教育、提高城乡之间的基本医疗水平、免费强化入职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数十年的人力资本投入,才为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棉纺业在内的各类国有和私营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使中国终于取代英、法、德、美等国,成为今天全球纺织工业的大国、强国和技术创新中心。

注释

- ①[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本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该书于2015年在美国出版后,旋即获得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奖,被《纽约时报》列为十大重要著作之一,在三年内被译成九种文字出版,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②③④⑥⑦⑨⑩⑪⑬⑮⑯⑰[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29、73、215、149、99、170、159、158、285、342、349、362页。⑤中央电视台节目组:《公司的力量》,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7页。⑧[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陈志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0页。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⑩[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229页。⑪⑫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36页。⑭靳凤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共享》,《光明日报》2021年1月4日。⑮庞珣、何晴晴:《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和国际格局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⑯[美]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陈耿宣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责任编辑:思 齐

International Ethical Conflict Between Global Justice and Power, Capital and Labor —Take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Logic of *Cotton Empire* as an Example

Jin Fenglin

Abstract: Sven Beckett's *Cotton Empire* is an economic history book tha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logic of the book, it can be clearly seen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t is the complex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interwoven and fierce conflict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global labor that has led to poverty and inequality among different ethnic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and deepened the wealth gap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in the world. To realize the global 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human society, we must st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deeply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 ethical conflicts among sovereign states,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global labor, and make them realize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practice.

Key words: global justice; sovereign states; transnational capital; global laborers